

新民时论

21 世纪的世界关注中国的经济,更关注中国的电子商务。中国社会要以创新的精神,让诚信的阳光照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道路。合力打造诚信网购,是艰巨的使命,也是更大发展的契机。因为诚信是道坎,网购跨过这道坎,未来必定是光明的。网购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。人们享受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购物便利,但也深深地企盼有一个良好的网购环境,不要为网络上的“伪劣假冒”商品而烦恼。打造诚信网购是人心所向,也是网购健康发展的基础。

诚信是“帝王法则”,维系着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,我们从“熟人社会”走向了“陌生人社会”。那种面对面的商品交换模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。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网上冲浪,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,这开创了商业模式的一个新时代。国外有句名言,“在网上,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”。商家和消费者在网上谈判、交易,不直接照面,诚信就成为突出的问题,并对诚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尽管有些经济主体可以在网上一次交易中通过欺诈

获利,但从长期来看,这种欺诈往往是得不偿失的。正如亚当·斯密所说,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人,“不盼望从一件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,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”。“诚实是最好的策略”,应该成为商家的座右铭。当然,打造网购诚信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,才能真正获得实效。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子商务企业是打造诚信网购的中坚力量,因此,前不久在淘宝和工商总局的纠纷中,马云才会被舆论逼得出来表态。阿里巴巴付出了不少努力,但产生的效果与飞速发

展的网购还不相适应,效果还难以尽如人意。阿里巴巴是世界级的电子商务企业,拥有一流的技术力量,只要下决心做,是不能难倒他们的。马云已经公开表态,“全力以赴解决假货难题”,这是值得欢迎的态度。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网络交易平台必须进行有效监管,更好地规范和促进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,社会各方也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。但监管方式、内容的科学性与合法性,要经得起有关企业和公众的质疑。对于企业的信息披露,需要慎重。在媒体高度发达、信息高速传播的

现代社会,一些信息可能会成就一家企业的成功,也可能会将一家企业推入深渊,甚至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影响。为了科学地、准确地打假,必须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,并达成共识。例如,什么是“正品”?“正品”与伪劣假冒商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?在互联网飞速发展、电子商务如火如荼的形势下,商品交易情况呈现出复杂的情况。原来的“正品”概念是否需要讨论,并进一步修订和完善,都是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基础性工作。打造诚信网购需要法律

规范,也需要道德自律。成千上万的商家在网络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,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打开了创业的天地,但其中也有一些无良商家昧着良心卖假货,欺骗消费者,激起了社会极大的义愤。消费者在网购中处于弱势地位,要鼓励消费者依法依规维权,但同时也要提醒消费者建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念。消费者对低价的过度追求会产生“价格倒逼”机制,不利于网购的诚信建设。(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,上海师大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,教授)

离间计

任大刚

结舌者言

1 月 20 日,中东地区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绑架 2 名日本人质索要 2 亿美元赎金的消息传出。此前该组织遭到欧美空袭,曾经提出“停止空袭”要求,但欧美国家并未理睬。此次仅仅提出赎金要求,英国专家分析称,此举或是为了离间与欧美有合作关系的国家。“伊斯兰国”使用所谓“离间计”,并非仅此一次。该组织 2 月 6 日声称,他们抓获的一名美国女人质在最近的空袭中被炸身亡。美国政府说,尚无可证明这一消息属实的证据。约旦方面则说,这是“伊斯兰国”搞出的“虚假宣传”。这个“虚假宣传”的用意,是离间共同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的国际联合力量。从这两个最新案例,可以总结出离间计的基本特征:双方处于敌对状态,释放虚假信息以破坏敌对方内部的团结。但是离间计要成功,并不那么容易,有一些先决条件必不可少。韩非子在他的著作里,讲了很多离间计的故事。孔子在鲁国做执政,路不拾遗。齐景公听说了,很忧虑。黎且对齐景公说:“除掉孔子犹如吹毛一样简单。大王您何不用高官厚禄招募孔子,同时送给鲁哀公女子歌舞队,助长他的骄虚之气。鲁哀公得到新的娱乐方式,必定对政务懈怠,孔子一定会劝谏;他一劝谏,鲁哀公怎么会听从呢?这样孔子与鲁国的关系就轻易断绝了。”齐景公道:“好啊!”于是让黎且把女子歌舞队送给鲁哀公。鲁哀公非常高兴,每天沉迷女乐,真的懒得理会政务。鲁哀公听不进孔子的劝谏,孔子只好离开鲁国,到楚国去了。从孔子的生平记载看,这个故事多半属于杜撰。但从人性的逻辑看,却有些抽

象的真实性。这个故事的关键词,是鲁哀公的人性弱点被利用。如果他不是一个好色之徒,不会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怠慢政务,齐景公就没有施展离间计的可能。郑桓公打算袭击邾(kuài)国,先打听邾国有哪些英雄豪杰、良臣能吏和果断勇敢的人士,并全部记下他们的名字。又选择邾国的良田,在这些田地之下,写上这些人的名字,表示他们都接受了贿赂;在他们名字之下,写上官爵名称,表示已被收买。办完这些事,郑桓公在城门外设了高坛,把上面这些记录掩埋在高坛下,洒上鸡和猪的血加以祭祀,弄得像真的结了盟似的。邾国国君信以为真,以为内部有人要发难,立刻杀了全部良臣能吏。郑桓公见离间计成功,一举偷袭了邾国,攻占了它。这则故事与上一则故事的共同之处,都是“主上不明”,缺乏判断力;不同之处在于,郑桓公在实施反间计时,释放了大量的虚假信息,迷惑了邾国国君的判断。从更高层面上看,实施离间计的土壤,往往针对的是信息不明的国家或团体,离间计要成功,更要利用主事者处断不明和人性弱点。因此,这种诡计多使用于信息很不透明的敌对双方,或缺乏信息传播手段的传统社会。而在一个透明社会,离间计则很难成功,因为相关各方的利益是基本透明的;如果是一个透明的、现代的社会,主事者的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,其人性的弱点得到遏制,动辄辄取、诛杀僚属的可能性很小,离间更不容易。从这点上看,“伊斯兰国”的所谓离间计,注定很难成功,因为国际反对力量之间的利益取向是透明的,而且这种力量的联合,非止具体利益的考量,还有更为宏大的道义感召,这是一种更大的、文明的力量。

少点硝烟就是进步

朱绩崧

北窗絮语

下周二要过年了。于我而言,实在有点害怕。前些年,平时省下点钱,都会出门去“躲年”。广州、香港、河内,这些原本陌生的城市都留下了我对春节别样的记忆:宁静。相比而言,上海除夕、接财神这两场雷打不动的大阵仗,客气点说,就是噩梦,我甚至常常在初一、初五中午醒来,发现自己不是在祝福谁,或期盼什么,而是在下意识地“沪骂”那些害得我深夜无法安眠的街坊邻里。我从不讳言对鞭炮的深恶痛绝。吵闹、污染环境、易引发火灾和人身伤害,这三项“控罪”想来是谁都无法辩驳否认的。所以,今年看到政府通过媒体,宣布严格执行“燃放令”,申城五部门带头承诺不放烟花爆竹,我深深感觉这是文明的悄然进步。不过,放鞭炮是民俗行为,用行政手段大约只能控制一时。让鞭炮害多利少的观点深入人心,才能有效地移风易俗。这几天,本市一位大学教授做了实验,用数据证明:售价 3 到 5 分的一只鞭炮就可以让 10 立方米的空气 PM2.5 爆表。这大概可令苦霾久矣的市民有所触动了吧。只是希望此类宣传能纳入公益广告,甚至中小学教材,成为环保舆论的新常态,而不是仅仅在过年时才抬出来惊世骇俗一把。在数据公布之前,网上其实已经有了一片讨伐鞭炮之声,那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广泛流传的一张照片引起的:一男一女两位老年环卫工人举着牌子,呼吁大家少放鞭炮,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,让他们早早回家过年。转发支持的朋友大概很少会想到,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,而无助于文明的进步。反

过来,近年因为鞭炮产业需求锐减,内地的鞭炮企业老板跑路的现象屡见不鲜,那是不是为了让这些企业的职工能拿到钱,过上年,我们就该多多购买鞭炮呢?与其大打煽情牌,不如回想一下,为何我们的民族对鞭炮如此钟情。民俗研究告诉我们,最早是为了吓走“年”这种怪兽,这显然是因为先民并不了解自然,有所恐惧和希冀。然而,随着近世科技的昌明,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,怪力乱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。只是这些年,随着改革开放,经济发达,有些人改善生活的意愿特别强烈,不愿投入聪明才智去了解各种金融变化的机制,却把财富增长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几声炮响之中,还美其名曰:民俗传统。这种所谓的民俗传统恰恰和最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相违背,那就是勤劳致富。古时说,“国之大事,唯戎与祀”,这是前工业时代的老皇历了。残酷的战争,人人都想远离,这是天下的共识。但“祀”却披上了各种外衣,依然颇有市场。本质上,“戎”是人与人冲突的解决方案,而“祀”是人与自然冲突的解决方案。而今天我们显然早就认识到,人与自然的冲突,或者人与人的冲突,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,而不能指望什么超自然的力量。今年,因为家人重病,我无法南下“躲年”了。不过,我相信,在这一场反鞭炮运动中,上海的确烟总会比往年淡薄些。新年伊始,许多人都许愿立志,而对于我们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来说,不也应该为推进文明而树立目标吗?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鞭炮只能找到一个去处:民俗博物馆。

“中国式盘问”

陈方

生活杂拌儿

从什么时候开始,回家过年竟然也成了一个问题”?各种各样的《春节回家万能攻略》在社交媒体上爆红,只是为了应付父辈的“中国式盘问”。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,单位效益很好,春节放假前除了发红包,还有各式各样的年货。那一年春节单位还发了一箱蔬菜,因为值班自己走得晚,蔬菜送人已不可能,留在单位宿舍里只怕会烂掉。掂量来掂量去,还是决定回家时带上。那时候还是绿皮车,我身后背着大包,胸前抱着一箱蔬菜挤上火车,咣当咣当 5 个小时赶回老家。北方冬季的蔬菜都贵得很,父母看我不嫌麻烦还抱着蔬菜回家,年夜饭时,他们还弟弟妹妹开玩笑,“多吃点菜,这是你哥大老远从石家庄抱回来的菜,不许浪费”。初一那天开始去和父母的同事们拜年,他们都会问我:“上班了,单位每个月发多少钱啊?”十多年前,我们当然已有“隐私”的概念,我也知道见面就问别人“挣多少钱”是很不礼貌的问候。但小县城里,没人讲究那么多。我理解他们的关心,父母和他们的同事都是工人,十多年前工资最高的时候也不过 700 元。而且工厂不景气,班上得断断续续,所以工资也经常“断顿”。子女们终于参加工作了,他们希望孩子们能比自己过得再好一些,再再好一些,关心你挣多少钱,其实他们是想抹掉那些内心的担忧。与父母相比,我的工资大大高出他们所料,所以工作后最初几年过年回家,我从不惧怕他们的各

种盘问。但后来,我的“比较优势”慢慢丧失了,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对象,每年过年回家都会听父辈的各式唠叨,“都快 30 了,再不找对象恐怕要一辈子打光棍儿了。”被他们盘问急了,我会狠狠回上一句,“你们凭什么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结婚不结婚的基础上?”狠话噎得父母七八天里不再过问我任何找对象的事,但到了第二年春节,他们依然会继续盘问。想一想,那些年过年回家,父母们的盘问和如今没有什么区别,只是当时社交网络还不流行,“中国式盘问”的标签也不曾出现。如今网友们为了应付家乡父老的各式盘问,娱乐化地制作出诸如“这个嘛呵呵呵呵”“那什么哈哈哈哈哈”等“技术帖”,甚至也有舆论认为“中国式盘问”中充满了功利色彩,“有没有房子,挣多少钱”,这些盘问中都隐藏着父辈对子女“衣锦还乡”的潜在诉求。其实,对于父母那一代人来说,他们的青春从艰苦磨砺中而过,他们的生活可能充满各式困顿,他们更希望下一代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。而且,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传统的父母来说,似乎只有孩子们工作稳定,收入可期,结婚成家,他们一辈子的使命才得以完成。单纯从人际关系方面说,“中国式盘问”带给年轻人的归乡焦虑,只是中国代际差别演绎的景象。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,“过年不过是怀念有情有义的生活”。对于父辈而言,也许他们的人生格局和生活履历决定了他们的“盘问视野”,或许他们只能用这样的盘问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儿女的情义。想想这些,突然觉得网络上的“回家攻略”多多少少消解了亲情的醇厚。